

符号的代码理论及大众交际手段

—— U.Eco 符号学思想研究

王铭玉¹ 项男²

(1. 天津外国语大学 校长办公室, 天津 300204; 2.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U.Eco 是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 同时也是世界符号学领域的权威, 他的研究涉猎广泛, 成果丰硕, 其中的符号代码理论备受推崇, 大众交际理论影响深远。代码理论是意指系统中的重要理论, 也是 U.Eco 符号学思想中的经典理论。大众交际理论是 U.Eco 符号学思想向传播学及文化学领域的延伸, 大众交际手段的符号系统及解码原则。

关键词: U.Eco; 代码理论; 大众交际手段

作者简介: 王铭玉(1958—), 男, 河南洛阳人,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全国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分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论研究; 项男(1974—),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2)03-0127-07 收稿日期: 2012-03-25

符号学界普遍认为, 欧洲大陆的符号学研究, 第一研究大国应该是法国, 而第二研究大国应该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之所以有此美誉, 主要是因为产生了 U.Eco 这样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符号学家。

U.Eco(1932—)是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 是国际符号学界的权威, 更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U.Eco 的研究领域辽阔而又多重, 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外, 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 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 8 大类 52 种^[1], 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 这些成果是他成为一代大师的明证。

1932 年 1 月 5 日, U.Eco 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大。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氛围浓郁, 自 20 年代兴起的新托马斯运动方兴未艾, 以至于 13 岁的 U.Eco 就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

行动青年团, 还在方济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后来, U.Eco 进入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 L. Pareyson 的指导下, 于 1954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 经过修改的论文于 1956 年出版, 更名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 1956), 由此初步奠定了他作为“中世纪研究学者”(medieval scholar)的地位。大学毕业之后, U.Eco 进入了新闻传媒的世界。先在电视台工作, 后到米兰的一家期刊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 同时他还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 逐渐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63 集团”(group 63)的中流砥柱。1962 年, 他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 1962), 凭借此书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

1964年,《符号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符号学研究步入新阶段。也是在这一年,U.Eco发表了论著《启示录派与综合派——大众交流与大众文化理论》(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 1964),自觉尝试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问题,这标志着他已经站在了意大利学术界的前沿。此前,他已经在都灵、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大学讲授美学,从1964年开始,他成为米兰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可视交往”(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关注建筑中的“符号”问题。1965年,他的论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发表于法国符号学阵地《通讯》杂志上,意味着他已经跻身于核心的符号学阵营。同一时期他又将《开放的作品》中有关詹姆斯·乔伊斯的部分修改内容出版,定名为《混沌宇宙美学:乔伊斯的中世纪》(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 The Middle Ages of James Joyce, 1966)。1968年,《不存在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出版,这是他数年研究建筑符号学的成就,也是他第一部纯学术性的符号学著作,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进入70年代,U.Eco的成就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1971年,他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座;1975年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 1975, 英文版本在1976年出版),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1979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了论文集《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1979)。此外,U.Eco还在美国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等著名院校授课,以符号学家声名远扬。

由中年步入老年的U.Eco视野愈加扩大,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学院与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纵横穿梭。作为学者的U.Eco一方面修改完善了自青年时代起就深为关注的中世纪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其符号学—阐释学理论,延伸或部分修正了昔日的观点。他陆续发表了《符号论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84)、《完美语言的探索》(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 1993)等专著,编著了近20本书籍,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1984)、剑桥大学(1990)、哈佛大学(1992—1993)、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96)等一流名校讲

学,还获得了全世界20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U.Eco也极为活跃,先后发表了《如何与三文鱼同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 1992)、《康德与鸭嘴兽》(Kant and the Platypus, 1997)、《五个道德片断》(Five Moral Pieces, 2001)等亦庄亦谐的杂文集,甚至为儿童写了两部作品。自1995年始,更是积极投身于电子百科辞典的编修工作,主持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部分,并在各地发表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说。

U.Eco的符号学理论秉承欧洲文化符号学的传统,同时又兼具英美科学主义的传统,颇值符号学研究者的关注。U.Eco融合了由F.Saussure倡导的欧洲式交流论符号学和Ch.Peirce倡导的美国式意指论符号学。从其思想发展脉络来看,他更偏向于Ch.Peirce的广义符号概念。与F.Saussure强调具有意图性的人工符号概念相比,U.Eco倾向于把其符号概念看做与Ch.Peirce一样还包括非人工符号和非意图性符号。这样,U.Eco的符号学体系就如同Ch.Morris一样的雄心勃勃,即从自然和自发的交流过程出发产生的交际系统,直到更为复杂的文化系统,都可以视作符号学的研究领域。

在语言符号学界,U.Eco的《符号学理论》一直备受推崇,可以说是一部继F.Saussure和Ch.Peirce之后的权威性符号学论著。这不仅是由于此书与同类书相比更具系统性,而且是因为,这位勇于创新的学者提出了一整套超越于前贤的理论见解,尤其是他所关注的符号代码理论更是为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关于代码理论

U.Eco认为,关于一般符号学的设想应该考虑到:(1)代码理论;(2)符号生产理论。代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不对应于“语言”与“言语”、能力与运用、句法学(及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区别。

从原则上讲,意指符号学蕴含代码理论,而交流符号学蕴含符号生产理论。

所谓“交流”,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定义为信号(未必是符号)从源点(经由传递物、沿着频道)到达终点的通行过程。在机对机过程里,信号就其可以决定外形刺激下的终点而言,无力指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发现意指,却有某种信

息的流通过程。当终点是人或“接受者”时(源点或传递物不一定是人), 只要它们按照人类接受者所了解的规则系统去发出信号, 这一点就成立; 相反, 我们正目击到一种意指过程——不过前提在于: 信号不仅仅是刺激, 而且在接受者身上激起一种解释反应, 这一过程是由代码的存在促成的。

代码是一种意指系统。当依据潜在规则, 实际诉诸接受者感觉的东西代表他物时, 存在着意指。意指系统是一种自动符号学系统, 它具有抽象的存在方式, 而不取决于任何促成其事的潜在交际行为; 相反(刺激过程除外), 每种指向人们或介于其间的交流行为——甚或任何其他生物或机械智能机制——都把意指系统预设为其必要条件。

总之, 我们可能独立于交流符号学而确立一种意指符号学; 然而, 没有意指符号学, 就无法确定交流符号学。

1. 代码

代码(code)这个词在古代词源学中是制度性法典之意, 即将诸法律条文按一定分类和次序排列在一起, 以避免彼此冲突或重复。在词源学中, code 与 codex 同源, 后者为拉丁文中的“树干”之意, 是古代书写工具, 后来人们用其表示书本。其后这个词被加以抽象使用, 逐渐含有以下的意思: “项目或单元之系列”和“排列这些单元的规则”。自从莫尔斯电码出现后, code 被引申为一部词典, 即提供一电信符号的系列和一字母系列之间的相关关系。在社会科学中此词的流行发生于控制论和信息论及生物遗传学诸学科创立之后, 这时它指一组信号在信息发出者和收进者之间的传递法则, 后者相当于一个二元制句法, 不涉及意义, 为纯操作性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 科学代码概念开始移用于人文学界。

在 F.Saussure 书中已出现过代码一词, 当时 F.Saussure 用其指 langue 的属性(按 U.Eco 解释), 或 langue 本身(按马丁内解释)。按此词在语言学中的这种原始用法, 它可大致解释为任何主题的一个规则系列, 包括语言规则系统。在现代语言学中代码概念的流行首推 R.Jakobson 之功, 他在 1956 年的《语言基础》一书中引用了几年前 C.Shannon 等在信息论中使用的这个词, 并将其与从信息论中借用的语言通信中另一个概念“信息”(message)并用。大约同时, Lévi-Strauss 将其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 此时它被明确地理解为规则、

系统、结构等, 以强调每一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是受规则制约的。而且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有同构性, 二者均受同一代码制约。

应该说, 代码一词侵入人文学界并非出于对人文话语进行科学化装饰的需要, 而是为了增加描述的准确性, 这就是增强话语符号学分析中的操作性倾向和强调价值中立性的结果。^{[2] 1542-543}

2. 水闸模式

U.Eco 借助代码模型来建立其一般符号学的意指关系规则系统, 他通过生动的工程学例子说明了意指系统和通信过程的关系, 其中, 最典型明了的例子是“水闸模式”。

模式的情景是这样的: 有一名工程师——位于下游——需要知道, 处于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并为水闸所阻断的一段水域, 何时到达一定的饱和平面, 对此, 他界定为“危险平面”。与此有关的信息项为: 有无水; 水在危险水平以上或以下; 上下程度; 上升速度。

此例中, 水域可视为信息源点; 工程师为了获取信息就在该水域放上一种浮标, 当水域达到危险平面时, 浮标就激活传递物, 使之能够发出一种电信号, 该电信号经由一个频道(一根电线), 并在下游由接受者获取; 这种手段把信号转变为一连串特定的成分(也即释放一系列机械指令), 它们构成了终点装置方面的讯息。在这里, 终点能释放出一种机械反应, 以便矫正源点的状况(例如打开水闸让水能慢慢排放出去)。这样就构成一种水闸模式, 见图 1:

源点 传递物 信号 频道 信号 接受者 讯息 终点
代码

图 1 水闸模式

在该模式里, 代码是保证特定电信号能产生特定机械信息, 并由此引起一种特殊反应的手段。^{[3] 38}

3. 非语言现象的分节结构

本世纪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 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它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在考察语言结构和非语言现象的意指结构问题时, 重要的是文化对象结构的分节方式问题。

所谓“分节方式”(articulation), 即诸部分之

间的联结方式、组接方式。按照马丁内理论,语言是由两个分节层组成的,即由有意义指示性的层次(第一分节层)和仅作为物质支持成分的无意义指示性的层次(第二分节层)共同构成。而如果一些非语言对象确实具有隐在的语言结构,那么它们首先应当也含有双层分节。

U.Eco认为,符号系统的联结方式多种多样,远不限于双层,而且一些符号系统并不具有分节联结结构,此外,诸可能的联结层次之间的结合方式也各有不同。U.Eco针对非语言现象,提出了6种符号分节类型(即由各种各样的组接方式形成的符号类型):

(1)无分节的系统(不具备组接形式的系统):以“超符号”(super-sign即有独立意指作用的符号)为主体,它们在成分因素之中无法进一步分解下去。

具有单个超符号的系统(如盲人的白色拐杖)。其出现意指着:“我是盲人”;而其不出现不一定意指前意的反面。

具有“零符号”载体的系统。如船上的司令旗。其出现意指:“司令在船上”;而其不出现意指:“司令已下船”。

交通灯。每一单元均指一种有待执行的操作。这些单元不能在自身内部组接起来以构成某种文本,也不能进一步分解为潜在的组接单元。

用单个数字或字母表示的汽车路线。

(2)只有第二分节系统的代码(只具备一级组接形式的代码):单元为超符号。这些成分不能进一步分解成符号,而只能被分解为符号素(figurae),而后者不表示主要单元的内容部分。

有两位数数字的汽车路牌标志,如第“63”路是指:汽车从X地开往Y地;该单元在[6]和[3]这两个符号素之间可以切分,但不具有任何意义。

海军旗语信号系统。用左、右臂各种倾斜姿势表示各种分节元(即“符号素”),两个分节元的结合可表示一字母,字母不是词,无意义,只有在作为一天然语言的分节成分时才有意义。

(3)只有第一分节的代码(也是只具有一级组接形式的代码):如单元可分为符号,但不会再分为符号素(即主体单元可以分解为符号,但不能由此分解为符号素)。

旅馆房间号码。如单元“21”通常表示“第二层楼上的第一间房”,它可以再分为符号[2],

意指“二层楼”,进而分解为[1],意指“第一个房间”。

交通信号具有可分为符号的单元。有红边的白圈内包一黑自行车轮廓即表示:“自行车禁止通行”。此单元却可再分为:“红边”,意指“不允许”;“自行车图形”,意指“骑车人”。

(4)具有两个分节的代码(带有两种组接方式的代码):超符号可分为符号和符号素。

天然语言。音素或音位被分节联结为语素,语素又被分节联结为更大的单元——组合段。

六位数的电话号码。其中有些可分为两位数组,每两位数分别代表城区、街道、个人,而一个两位数符号本身可分为两个无意义的符号素。

(5)具有流动性分节的代码(具备动态组接形式的代码):有些代码虽有符号和符号素,但其作用各有不同(即在某些代码里,可能既有符号,又有符号素,但并不总是具有同一功能。符号可以变为符号素,或反之,符号素则变为超符号,其他现象也可具备符号素的价值)。

调式音乐。音阶符号是符号素,它们可分节联结为符号,如中止符与音符,二者可联结为乐段。

牌戏。它包含第二分节的成分,后者参与构成了具有意义的符号。但其中也有些无第二分节的符号,如“国王”与“皇后”等肖似性超符号。

(6)三层分节代码:这类代码的唯一例子是出现在银幕画面中的,如视觉上无意指作用的光符号素,其组合可形成有意指的现象:形象、肖像或超符号。^{[3]266}

4. 非严格代码系统

符号系统的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严密性,如果说天然语言符号系统具有较强的结构组织性,那么各种非语言符号系统则大多只具有较弱的结构组织性。U.Eco称后者为“非严格编码的”符号系统。

(1)风格化编码类型。

有些肖像符号的肖似性,不是因其与被意指物内容的模式类似,而是因与表达形式的类似而被识别,它不是严格强制性的,其中往往含有许多“自由变元”因素。如“国王”、“皇后”这类扑克牌中的超符号,我们并非依据肖似性识认一个“人”,然后再识认其为“国王”,而是直接理解所指者为“国王”,因为可依靠对适切特征的认识达到此目的。这类准肖似性关系称作“风格化”

(stylization)编码。例如,纹章特征——英国皇室卫队的独角兽徽;宏观特征——建筑中的房屋、寺庙、广场、街道中的诸风格特征;音乐样式——“进行曲”式;文学或艺术样式——“西部片”、“滑稽喜剧”类;识别代码——斑点可意指“豹”,条纹可意指“虎”;肖像素(iconograms)特征——肖像学所研究的“耶稣诞生图”、“最后的审判”、“启示录中四骑士”。某种香气可引申意指“引诱”、“欲望”,而另一种香气可引申意指“个性”;烧香气味可引申意指“教堂”;等等。

在上述例子中,符号的肖似度(即能指与所指特征的相符性)各有不同,但各类意指作用方式都是明显约定性的或习惯性的。人们只不过利用肖似性符号的某部分风格化特征,经惯约性编码后,使其有专门所指。

(2) 矢量性编码。

这是一种表示各种广义“方向”的因素,U.Eco称之为“矢量”(vector)和“矢量化”(vectorialization)编码方式。在天然语言中也有大量矢量性特征,如“约翰打玛丽”一句中的词序性可使句子内容被理解(汉语的矢量性特征就较明显)。不过U.Eco说,矢量特征不能成为独立符号进行表达,而只能作为表达面的成分(如以语言性质来解释,可理解为言语平面上的线型特征)。^{[2] 519-521}

二、关于大众交际手段

U.Eco拥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对传播学及大

众文化理论均有独到的见解,将符号学思想应用于大众交际手段的研究,是U.Eco对符号学的另一项突出贡献,其主要内容为大众交际手段的符号系统及大众交际手段的解码。

1. 大众交际手段的符号系统

大众交际(mass communication),指在数量庞大的、分散的受众当中,通过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带、录像带、网络等渠道,对信息进行系统地传播,目的是确立社会的精神价值,同时对人们的评价、意见、行为,施加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组织方面的影响。^[4]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交际手段就是将社会信息进行大众传播的手段。U.Eco将电视与电影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大众交际渠道,认为对两者的研究可以推广至大众交际的所有领域。

(1) 电视报道中的码系统。

大众传播,指的是大众信息的传播,大众信息的核心要素是报道,从符号学的视角看,大众交际中的报道是各种符号手段的综合体,这些符号手段的构建通常基于一个或者更多的码,构建的目的是将以码为基础的阐释进行传播。U.Eco认为,电视报道是最为典型的大众交际报道,在电视报道中可以同时采用几个码,码与码之间的关系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竞争。U.Eco以电视报道为例,归纳了3个码系统,每个码系统之下包含数量不等的子码系统^{[5] 90},如表1所示:

表1 电视报道中的码系统与子码系统

码系统	子码系统	
1. 肖像码 (即索引码,这里能指与所指的相互关系为说明理由、提出论据等)	a 圣像亚码 (形象聚合体)	某些形象基于传统而具有一定的含义。例如,一位微笑的老人与张开双臂向他跑来的幸福小孩,这里的老人通常表示爷爷
	b 美学亚码 (形象聚合体)	由品位方面的传统来决定,属于一定的表征系统,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的”
	c 情色亚码 (形象聚合体)	对于某一行为标准的肯定与否定是基于规约的
	d 蒙太奇亚码 (一系列组合)	与电影或电视的图解规则一致。如,对于b码和c码来说,一个是从前面拍,而另一个是从肩部拍,表示的是同一个人
2. 语言码	a 专门化的行话	表示专门群体的用语
	b 修辞组合体	表示社会阶级、角色归属等
3. 声音码	a 情感亚码	如,新闻节目之前的音乐,通常符合一定的音乐风格
	b 带有修辞价值的组合	选择一定的音乐风格(古典的、饶舌的、爵士的),不仅可以传递情感上的伴随意义,还可以传递意识形态上的伴随意义
	c 带有规约价值的组合	如,国歌

码系统与子码系统共同参与到电视报道中来,每个独立的报道都应该包括三个要素:报道发出者的意图、报道的客观结构、以及报道受众对前两者的反应。对任何一个符号系统进行分析,都应遵循相应的研究原则。对于大众交际手段的符号系统来说,其研究原则主要是基于两组关系,即大众交际产品与发出者及受众的关系,以及大众交际产品与码的关系。可以说,大众交际手段的符号系统不是普通的手段系统,而是含义的系统。

(2) 电影语言中的十大代码。

电影是大众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电影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就是对电影语言进行研究,也可以说是把电影作为语言进行研究。在这里,电影语言不同于经典电影理论中的电影语言概念,而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言概念。因此,符号学视角下的电影研究,是把电影作为一种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来进行研究,亦即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探索电影文本的语言特性,揭示电影表达系统中的记号及其结构规律的问题。^{[6]27}

U.Eco 借鉴了 Ch.Peirce 的符号三分法,将电影记号分为肖似记号、象征记号和指示记号。在此基础上,U.Eco 提出了著名的电影语言三层分节理论,即认为电影语言是由影像构成素层、影像记号层和运动素层三部分构成的。在进一步的研究的过程中,U.Eco 用通信代码与信息替代了 F.Saussure 的语言规则与言语过程,从而把对电影语言结构的研究引入到信息论的广阔领域。他把单独的影像看作记号,而把决定信号表意功能的条件称作代码,U.Eco 认为如果信息受众获得了理解,这就意味着在这种理解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代码。

十大代码理论阐发的就是 U.Eco 从电影语言中找寻和归纳出的十种不同的代码。它们是知觉代码、识别代码、传递代码、声调代码、肖似代码、肖似化代码、趣味感觉代码、修辞性代码、风格代码及无意识代码。^{[6]28-29} 知觉代码,是最一般的代码,它规定着电影本义的基本知觉条件;识别代码,作用是把上述知觉条件组织成相应的识别图式;传递代码,决定着记号载体的一些物理特征,以保证有效的美感特征的传递;声调代码,决定着观众对电影声音记号的感知及相应联想的产生;肖似代码,决定观众在识别了一定的图式之后而认知这种识别图式所表现的现实存在事物

的代码;肖似化代码,是把肖似代码中的所指转换为另一意指关系中的能指,以含蓄地意指较为复杂的和具有文化性联想含义的意素;趣味感觉代码,与上一种代码很相近,只是更加依赖于文化条件,因而也更加抽象,在这里,最终被意指的意素不再是物质实体,而是抽象观念或情感;修辞性代码较之趣味感觉代码更加依赖文化习俗与社会语境,记号所意指的事物更具有观念性、关系性与模糊性。风格性代码,是关于电影表现风格的代码;无意识代码,是更隐蔽而无法描述的代码,上述各种代码最终都要受这种隐在的代码系统制约。

2. 大众交际手段的解码

大众交际过程中,当向不同状态中的受众发出信息时,受众实际上接收到了什么?是同一个信息、相似的信息,还是完全不同的信息?对大众交际手段进行解码,就是对大众交际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解读,解读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码的应用规则。U.Eco 认为,需要遵循交际规约与偏离解码的原则。^{[7]90-105}

(1) 交际规约。

交际规约既是聚合式的结合,又是组合式的构建。聚合式的结合,指将带有语义含义的一系列符号结合到一起;组合式的构建,指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受控于组合规则,受控于符号组合式构建的秩序。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在对大众交际手段进行解码时,码不是普通符号的系统,而是具有规约意义的符号系统,码同时还充当符号使用中的规约规则。符号机制本身可以被称为码的“字典”,而符号使用的规则被称为“语法”。换句话说,码是一种方式,是发出者组织信息的方式,也是受众解读符号含义的方式。简言之,码是传递意义的手段,人们应用码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同时阐释别人的行为。码如同是用来找寻含义的地图,只有经过一定的码,符号才能获得自身的含义,在各种码中符号有不同的含义。

文化通常被称作宏观码,文化码由大量的码所组成。当社会成员已经成年,并且社会化之后,他们便学会了间接地理解现实性,这里的“间接”,就是指需要经由文化,经由与其他人共同的码系统。一种文化的所有承载者都熟悉码的规约性。例如,在东方的文化中,女性的码是:裙子、长发、修指甲、化妆、高跟鞋等。社会成员中的个体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码,甚至可以反对这个

码,如穿肥大的裤子、不化妆等等,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种文化码。在大众信息的广告中,“文化能力”通常举足轻重,文化能力指的就是一定文化的码的含义。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具有同构性,两者均受同一代码制约。^{[8]105}

(2) 偏离解码。

大众交际的过程囿于某种文化框架,这一文化框架往往决定受众的知识结构,如意识形态、伦理、宗教信仰、心理定向、品位及价值体系等方面的知识。大众交际手段正是应用于这样的文化框架之下。对于大众信息的发出者来说,首先要挑选出想要传播的含义,然后将这些含义在信息的各个层级进行有目的的“包装”,这一过程中,发出者必须兼顾到受众所处的文化框架。在发出者看来,受众的文化框架与发出者的文化框架可以相似,也可以不相似;发出者甚至可以尝试通过大众信息的某一内容对受众的文化框架加以补充。U.Eco将这样的框架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系统,是先于具体报道的含义系统,意识形态系统与修辞建构系统相互影响,并且随时调整符号手段、信息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所有这些要素可以被确定为含义系统。^{[3]332-340}在文化框架下,往往通过表征(对现实性要素的码所进行的表征)来塑造大众交际过程中的原型,包括社会群体、阶级、年龄、民族性及总统、童年、母性、爱国主义等。例如,未成年人的大众交际原型通常是一定风格的服装、音乐、语言、活动类型等。

大众信息通常是在不加分别的受众中进行传播,不同的受众会按不同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读。

在大众传播的情况下,信息的发出者及信息受众通常使用不同的码。经过受众解码后的信息的含义,通常与发出者置入原始信息中的含义不完全一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多种多样,如语言上的差异、时间上的间隔、阐释学传统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等。这些原因导致了受众对信息进行解码时产生偏离。U.Eco认为,偏离解码的原则是解读大众信息的基本原则,可以用来研究大众交际的所有现象。

对面向大众的信息来说,偏离解码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在发出者看来,含义最深刻、内容最充分的信息,对受众来说,有可能是最难清晰理解的信息。信息受众拥有解码的自由,这种自由大大减弱了信息发出者(包括信息传播组织)的影响力,结果是在理解过程中造成了两种形象之间的断裂,一个是由报道发出者塑造的,并通过大众交际渠道所呈现的形象,另一个是受众所理解的形象。因此,U.Eco主张,文化共同体也好,政治组织也好,在关注信息发出者的同时,应当集中致力于受众,正是在受众的意识中,始终存在着有关含义的各种解读。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U.Eco的学术视野广博而又多重,理论见解独到而又深邃。U.Eco所倡导的符号代码理论,以其完善的系统性和超越前贤的创新性,在世界符号学界独树一帜,U.Eco对大众交际手段所进行的分析,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学科的交融,为符号学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 [1] “Porta Ludovica”. 博洛尼亚大学设立.
- [2]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3] 艾柯著, 卢德平译. 符号学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4] <http://bse.sci-lib.com/article074214.html>.
- [5] Калинина. Е. Ю. О семиотике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G]//Язык СМИ как объект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C]/ Под ред. М. Н. Володиной. Ч. 2. М., 2004. .84-96.
- [6] 王佳泉, 唐海龙. 艾柯“十大代码”理论的读解与批判[J]. 东疆学刊, 1992, (2).
- [7] Эко. У. К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му анализу теле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общения[M]. <http://www.nsu.ru/psych/internet/bits/eco.htm>.
- [8]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叶 素]